



月光城 随笔

清朝之前的黄山茶

赵焰

是茶始于比丘大方,大方居虎丘最久,得采制法。其后于徽之松萝结庵,采诸山茶于庵焙制,远迩争市,价倏翔涌,人因称松萝茶。”《歙县志》也载:“明隆庆,僧大方住休之松萝山。制法精妙,群邑师其法。因称茶曰松萝。”这些记载,点明了松萝茶的由来——是苏州虎丘大方和尚来徽州后所研发。据说明朝时徽州最有名的“松萝茶”,也是大方和尚到了休宁后,以休宁城郊松萝山一带的茶叶,用炭火炒青做出来的。如此方式制作出来的茶,色重、香重、味重,喝起来很过瘾,有罕见的松针清香。

明代许次纾《茶疏》记载道:“若歙之松萝、吴之虎丘、钱塘之龙井,香气浓郁。”徐渭在《刻徐文长先生秘集》中,曾将松萝茶列为当时三十种名茶之一,有“松萝香气盖龙井”之说,这一个评价,是很高的了。袁宏道曾经记述:“近日徽有送松萝茶者,味在龙井之上。”袁宏道是当时的名士,“公安派”的代表人物,于茶的研究颇为透彻,曾受好友、戏剧家潘之恒之邀来徽州“打秋风”。袁宏道到了黄山脚下,应将徽州诸多茶种喝了个遍。袁宏道得出这个结论,虽是个人体验,也带三分道理。

清代郑板桥曾于某一天喝了某个徽商给他泡的徽州松萝,七窍顿开,兴奋异常,曾作诗抒怀:“不风不雨正晴和,翠竹亭亭好节柯。最爱晚凉佳客至,一壶新茗泡松萝。几枝新叶萧萧竹,数笔横皴淡淡山。正好清明连谷雨,一杯香茗坐其间。”

万历年间,曾任徽州府推官的龙膺将松萝的制作方法写进了《蒙史》:“予理新安时,入松萝,亲见之,为书茶僧卷。其制法是:将铛磨擦光净,以干松枝为薪,炊热候微炙手,将嫩茶一握置铛中,札札有声,急手炒匀,出之箕上。箕用细篾为之,薄摊箕内,用扇扇冷。略加揉捻,再略炒,另入文火铛焙干,色如翡翠。”如此看来,“松萝”有松针的清香,的确有松树的功劳。皖南多松树,松萝生长在松柏之中,有意无意地带有松针的地域香;以松针为燃料,又让茶叶带有松针的高火香。茶之所以叫“松萝”,应跟它带有松针的味道有关。

松萝声名鹊起后,官府将之纳入专营体系变成统购统销,社会上不常见了,民间必定有人不服,于是一些仿制假冒产品也随之出现。明代吴从先在《茗说》中说:“松萝子土产也色如梨花,香如豆蔻,饮如嚼雪。种愈佳,则色

愈白,即经宿无茶痕,固足美也。秋露白片子更轻清若空,但香大惹人,难久贮,非富家不能藏耳。真者其妙若此,略混他地一片,色遂作恶,不可观矣。然松萝地如掌,所产几许,而求者四方云至,安得不以他混耶。”《通志》说:“宁国府所属宣、泾、旌、太诸县,各山俱产松萝。”《歙县志》云:“茶概曰松萝。而歙产本轶松萝上者,亦袭其名,不知佳妙自擅地灵,若所谓紫霞、太函、幕山、金竺,岁产原不多得;其余若蒋村、径岭、北湾、茆舍、大庙、潘村、大塘诸种,皆谓之北源。北源自北源,又何必定署松萝也,然而称名者久矣。”类似记载,《徽州府志》《黟县志》《婺源县志》等方志中都有。

松萝茶遍布,跟官府不公、徽州农人对现状的反抗有关,也跟当时普遍缺乏科学的品牌保护机制有关。官府只想着强行攫取,农户们当然不买账。皖南山区自然条件大差不差,茶叶质地都属上乘,只要工艺不走形,所产茶叶都属好茶。再说,松萝松萝,不就是有着松针的清香吗?徽州茶园大多与松林相伴而生,杂树生花,哪一种茶叶中,不携有松针的清香呢?就这样,因为处处皆松萝,松萝的品牌一下子演砸了——再好的东西,也架不住一哄而上泥沙俱下啊!也因此,自清中叶之后,徽州已再无松萝茶了。

有一种说法以为龙井做法来自“老竹大方”,说龙井原先是条茶做法,跟碧螺春相似,杀青和揉捻均在铁锅中一气呵成,后受大方茶影响,在铁锅中杀青时,加入用手掌挤压之工艺,故炒出来的茶形变得扁平。这一段历史,我缺乏研究,也不知真假。龙井无论名气和历史,都非大方所能比。龙井茶为宋代辩才和尚所发明,此辩才系宋仁宗时代的和尚,非唐初智永和尚的徒弟辩才。有关“老竹大方”的说法是:大方和尚在休宁制作“松萝”后,准备翻越昱岭关回浙江,没想到在老竹铺、三阳坑、金川、福泉山一带发现了上等的茶树。大方和尚不忍放弃,于是驻扎下来,尝试着创制一种新的茶叶。他根据这种茶叶的特性,先摘取芽头,待叶芽稍萎凋,忽发奇想,在用炭火于铁锅中炒青之时,加入按压技术,将茶叶压成扁平形状。如此做法,本是想解决包装和运输中不被压碎的问题,没想到做出来的茶叶色泽鲜嫩,鲜爽光亮,泡出汤色碧绿,醇厚浓酽,有花香和栗香,较龙井的高火浓香,更有青枝绿叶的纯真和甘甜。

陆羽在《茶经·卷下》一章中,曾详细列举其时产茶的“八道十三州”,歙州忝列其中。那时还没有安徽的概念,歙州也就是后来的徽州,属于“浙西道”管辖范围内。陆羽是否来过歙州,尚无史料证实,不过他与歙州人交往颇多,与祖居歙州祁门的隐逸高人张志和是好友。张志和十六岁中明经科,向唐肃宗上书献策,唐肃宗极欣赏其才华,赐张志和奴婢各一人:男名渔童,女叫樵青。张志和成人之美,允二人结为夫妇。人问其故,张志和答道:渔童的任务是拿竿划船,樵青的任务是打柴煎茶。由此看出,张志和好茶胜过好色。张志和后来担任左金吾卫录事参军,因事遭贬,降职为南浦县尉。黄粱美梦破灭,自此看破官场,浪迹江湖,自号“烟波钓徒”,往来于杭州和湖州之间,与陆羽、裴修、颜真卿等人一起寄情山水。尤其与陆羽交好,平日里煮茶喝茶品茶说茶。陆羽应从张志和那里得到了一些有关茶的经验和见解。张志和曾经将祁门的茶赠予陆羽尝鲜,陆羽对此印象深刻,故将徽州茶写进了《茶经》。

祁门产茶,且历史悠久,沾的是鄱阳湖的光,成为长江航运的一部分。唐朝时,鄱阳湖边有中国最大的茶叶批发市场浮梁。白居易《琵琶行》“商人重利轻别离,前月浮梁买茶去”,由诗可见浮梁茶市的兴盛。浮梁之所以兴起,主要是因为漕运——古时交通运输主要是水路,大宗物资必须走水路,那时的鄱阳湖面积更大,周围河流密切浩汤,进出长江很方便,再转道京杭大运河北上或南下,可以到达全国大半地区。浮梁茶市兴盛,自然带动了周边地区,包括祁门和徽州茶叶的种植和采摘。公元862年歙县司马张途曾记载:祁门十户人家就有七八户种茶,茶色黄而香。从唐末一直到元朝,东南地区一带外贸发达,泉州、明州和广州为重要的通商口岸,鄱阳湖一带的船只可以通过赣江南下,过大庾岭到广州,或者通过闽江去泉州。商路的发达,带动了现在赣北和皖南地区的茶叶生产。徽州茶在历史上的地位,以情理和逻辑来推断,应该不弱。《敦煌变文集》就有记载:“茶为酒曰:阿你不闻道,浮梁歙州,万国来求。”浮梁歙州并称说明什么?说明黄山脚下茶叶的生产和经营,跟浮梁一样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。

从相关书籍看,最早的徽州茶,不是绿茶,也不是红茶,而是饼茶。饼茶的喝法在唐代是将之取块煮汤;在宋时,则是捣碎碾成细末,制成抹茶。

唐代杨晔《膳夫经手录》:“歙州、婺州、祁门、婺源方(饼)茶,制置良好,不杂木叶……人皆尚之。”具体的做法是:“将鲜叶经蒸气杀青后烘干捣碎,碾成细末,再蒸软,做成长条,形成圆饼状,中间留一孔,穿串起来烘干即可。”之所以将茶制成圆饼的形状,主要是方便保存和运输。不像散茶,占的空间太大,本身又太娇贵,在人们生活尚未达到一定水准、社会不太发达之际,饼茶是最好的选择。

从宋代开始,徽州就是一个产茶区。《宋史》说歙州等地产茶,“有仙芝、玉津、先春、绿芽之类二十六等,”列举了当时徽州茶叶的品牌。歙人罗愿在《新安志》中,延用了《宋史》的说法,表述得更详实:“茶则有胜金、嫩桑、仙芝、来泉、先春、运合、华英之品;又有不及者,是为片茶八种。其散者曰茗茶。”其时徽州茶的产量,据李心传在《建炎以来朝野杂记》中记载,每年大约有210万斤,约占全国的二十四分之一。朱熹的外祖父祝确,曾经富甲徽州,被称为“祝半州”。有人推测祝员外所做生意,有可能是私底下走私茶叶去海外。以常理来推测,那时盐业尚未开放,只是卖木材和土特产,哪会拥有那么庞大的财富呢?

南宋以后,海上贸易发达,西洋来的外国商人极喜欢黄山茶,他们自己摸索出一条经验:凡是黄山山脉出的绿茶,第一泡的汤沫都特别白,而且特别醇。自此之后,这些阿拉伯、波斯和犹太商人掌握了辨别黄山茶的方法,在交易中刻意遴选黄山茶。以现代科学的成分分析,更容易从气候条件、水土成分、海拔高度和茶叶品种等科学路径,确定黄山茶的等级和特点。以黄山茶叶简单的分法:北麓的崇山峻岭,以及沿太平湖一带是太平猴魁的原产地;黄山南麓,则是黄山毛峰的地盘。黄山毛峰和太平猴魁,慢慢成为了徽州茶的象征。《徽州府志》记载:“黄山产茶始于宋之嘉佑,兴于明之隆庆。”清代江澄云《素壶便录》:“黄山有云雾茶,产高山绝顶,烟云荡漾,雾露滋培,其柯有历百年者,气息恬雅,芳香扑鼻,绝无俗味,当为茶品中第一。”明代的《随凤录》记载:“松萝茶近称紫霞山者为佳,又有南源、北源名色,其松萝真品殊不易得。黄山绝顶有云雾茶,别有风味,超出松萝之外。”

明代徽州最有名的茶,不是毛峰,而是松萝。松萝茶,由核心产区休宁县松萝山而得名。明代冯时可《茶录》中称:“近出松萝最为时尚……